

岱庙碑刻研究

陶莉 著

齊魯書社



岱庙碑刻研究

陶莉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岱庙碑刻研究/陶莉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333 - 3437 - 6

I. ①岱… II. ①陶… III. ①寺庙—碑刻—研究—
泰安市 IV. ①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1078 号

岱庙碑刻研究

陶 莉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3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437 - 6

定 价 69.00 元



引 言

岱庙是因泰山而建的庙,是古代帝王为奉祀泰山神灵而创建的一座宫殿式建筑群。岱庙作为帝王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善男信女朝山进香的圣地,千百年来,封建帝王的封禅祭祀、文人墨客的即景抒怀、黎民百姓的禳灾祈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之一就是碑刻。

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由于战乱及政治原因,岱庙内的许多碑刻遭到严重破坏,如原立于岱庙仁安门、配天门间的明代20余通告祭碑,岱庙著名的四壁嵌有碑刻近百通的环咏亭,均毁于民国战乱,但保留至今的古碑仍有近200通,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刻立、迁入的碑刻,岱庙内现共存有碑刻300余通,可谓碑碣林立。其中,秦碑1通,汉碑2通,魏晋南北朝碑5通,隋碑1通,唐碑5通,五代十国碑4通,宋碑11通,金碑6通,元碑9通,明碑49通,清碑86通,民国碑6通,无明确年款的碑刻15通,余者为新中国成立后至现代碑刻100余通。这些碑刻,或佐证历史,或点景抒情,或寓理成趣,丰富了泰山的文化内涵。

岱庙现存碑刻的来源:一是岱庙旧存的,如《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明洪武去东岳封号碑》等,占岱庙现有碑刻的三分之二强;二是出于保护的由庙外迁入的,据统计,岱庙现存碑刻中有60余通是由泰山其他庙宇或泰安地区其他县市移入的,如《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汉张迁碑》等名碑。为保护碑刻,将碑刻集中存放,自古即有这一习俗,正如现存岱庙的清代《复得〈徐世隆诗碑〉之记碑》所言:“碑版往往与史乘相发明。泰山名碑林立,尤足以资参考……爰命各庙住持,凡有古碑者,皆敬谨保护,以资博古者之采择,是所厚望焉。”这是清道光年间岱庙道纪禹贞文的识见,现存岱庙的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徐世隆题蒿里神祠诗碑》即为禹贞文与监院姚能和在蒿里山乱石中发现,并于清道光七年



(1827)移存岱庙的。

碑刻题记是中国古代记载史实、保存和传播文化的独特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说道:“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①因此,碑刻有着其他形式文献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岱庙所藏碑刻内容有封禅告祭、庙宇创建和重修、文人题诗吟岱、墓志等,从其文献价值看,由于泰山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岱庙现存的碑刻题记不仅是考察泰山地区的原始文献资料,亦是考察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文献资料。许多碑刻是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真实、直观的记载,如《宋大观圣作之碑》《大宋封祀坛颂碑》等,有些碑刻则是考察佛道发展的重要史料,如《唐双束碑》《明五岳真形之图碑》《唐幽栖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等;还有些碑刻既是考核史事异同、补史志之缺失的重要文献,亦是当今文物保护中历史遗址恢复的重要原始依据,如《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清康熙重修岱庙记碑》等。

岱庙碑刻就其书体而言,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佳作迭出。以书法价值论,秦汉时期的碑刻书体均为该时代的代表作,如《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汉张迁碑》等名碑,体现了书法演变的历史,有着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的碑刻书法多而精,且多为名人手迹;明清碑刻、题诗、题记书体变化多端,犹如百花齐放。

本书仅选取岱庙主要碑刻近 50 通,为读者提供第一手宝贵材料的同时,试图就碑刻的文物、书法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做出阐述,希望本书能为读者了解泰山、游览岱庙、赏析碑刻提供有益的帮助。

注释:

①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目 录

引 言	(1)
卓绝千载——名品名碑	(1)
秦泰山刻石	(3)
汉衡方碑	(13)
汉张迁碑	(18)
晋孙夫人碑	(23)
北魏羊祉夫妇墓志铭	(28)
唐双束碑	(37)
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	(59)
宋种放《会真宫诗》题跋残碑	(66)
宋大观圣作之碑	(75)
元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碑	(82)
明五岳真形之图碑	(87)
明太极图碑	(94)
法古事礼——封号祭祀碑	(99)
宋青帝广生帝君之赞碑	(101)
大宋封祀坛颂碑	(105)
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	(115)
明洪武去东岳封号碑	(123)



明洪武祭祀碑	(129)
灵宇沧桑——创建重修碑	(133)
唐幽栖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135)
大宋天贶殿碑	(142)
宋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碑	(152)
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	(159)
元创建藏峰寺记碑	(164)
清康熙重修岱庙记碑	(168)
清乾隆重修岱庙碑记碑	(176)
言志篇章——咏岱题名碑	(183)
明清文人题诗题名碑	(185)
清乾隆皇帝御制诗碑	(200)
方碑	(214)
史海钩沉——颂德记事碑	(223)
金谷山寺敕牒碑	(225)
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碑	(230)
清康熙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	(240)
清康熙“禁止舍身”碑	(247)
清泰邑合山会姓氏组碑	(252)
清岱庙庙产碑	(256)
清光绪曹公渠碑与双龙池碑	(265)
附录:岱庙碑刻一览表	(270)

卓绝千载

名品名碑





秦泰山刻石

如果说泰山是一座天然的石刻艺术博物馆,那么现藏于岱庙东御座内的秦泰山刻石就是镇馆之宝。秦泰山刻石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由秦丞相、书法家李斯亲笔所书,是秦王朝“书同文”的实物例证。秦泰山刻石历经 2200 余年,现残存 10 字,为书法文字的“稀世珍宝”。



秦泰山刻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秦王朝的统治,自公元前 220 年开始至公元前 210 年,短短十年时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巡视,并先后刻立了峄山刻石、泰山刻



石、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琅邪台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 7 块刻石。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具历史价值的是刻立于公元前 219 年的秦泰山刻石，它是泰山封禅最早的实物见证。其铭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著明，陞于后嗣，顺承勿革。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礼，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①

刻辞全文共 144 字，以小篆书写。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登基后，即步其父后尘进行东巡，“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②。二世的这次巡行，在始皇刻石旁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③

二世诏书共计 78 字，加上始皇刻石 144 字，从而形成 222 字的秦泰山刻石。《史记·封禅书》说：“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言明刻石即在泰山顶，但具体位置不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曾以秦泰山刻石作为参照物说事，其云：“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④从岱顶山势论，文中所言高耸的“圆台”只可能是今无字碑前的平台，如再以记文中的空间距离看，秦泰山刻石当在这一平台之南，这从方位上讲也与记文相合，其具体位置大致在《明去封号碑》左右。明清史志所云“秦篆碑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后”^⑤、“秦篆碑，在玉女池西”^⑥等说法，皆后来之事。玉女池之西摩崖，明人申旆题曰“秦断碑”，即可知秦泰山刻石移此处时已断残。

关于刻石的形制，宋人刘跂在其《秦篆谱序》中是这样描述的：“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砢。”^⑦宋政和四年（1114），东平人董道又亲自到岱顶考察此石，他在《广川书跋》中云：“余至泰山，就视其石，高才八九尺，方面二尺余，以乱石培其下。昔所建立，盖凿



石为穴，下寝其中，岁久摧仆，则后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则止，此未可以久远期也。”^⑧在刻石的高度上，刘跂与董道描述有所不同，其高度之差，应是“累石固其趾”之故，而对刻石形制的描述是一致的。自秦泰山刻石刻立至北宋政和年间 1300 余年，虽有些字已不可读，但其形制基本保持原状，正如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所云：“（秦泰山刻石）四面皆无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⑨故秦泰山刻石当为“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的自然石，刻石的高度为八九尺，其中埋入地下部分为四五尺，地上字面部分亦四五尺。这里所说的“尺”为宋尺，换算成厘米，八九尺当为 250 厘米至 270 厘米。石的四隅为四个棱面，其宽度不少于一行铭文的宽度。石有四个主面，各面的上下宽度皆不相同，即上部略微宽于底部。从董道的记述看，文字是环刻于四个主面的上半部的。

对于秦泰山刻石文的布局，刘跂在《秦篆谱序》中也做了明确的记述：“（秦泰山刻石）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词……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⑩关于刻词文字，刘跂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对秦泰山刻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捶拓，得刻石大部分内容，并与《史记》所录内容相比较，补出了碑刻所缺内容，同时还发现《史记》录入的错误，如：“《史》云‘亲巡远方黎民’，而《碑》作‘亲巡远黎’；《史》云‘大义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后世’，而《碑》作‘陲于后嗣’；《史》云‘皇帝躬圣’，而《碑》作‘躬听’；《史》云‘男女礼顺’，而《碑》作‘体顺’；《史》云‘施于后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诏书刻石’，而《碑》作‘金石刻’。”^⑪

二

秦泰山刻石于公元前 219 年立，也就是秦始皇“书同文”政策实施后不久，因此可以说秦泰山刻石的刻立，既有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初衷，也有推广规范文字的意义。小篆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云：“周之季世，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书体乃定于一，所谓秦篆者也。”^⑫“秦篆”即为小篆。于七国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秦王朝，立国之初常常因书写文字的不同而致政令不通，从而影响国家的统治。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李斯的建议下，秦朝统一规范了文字。据史料记载：丞相李斯、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人以秦国籀文为基础，参考六国文字，删繁就省，而形成秦时的官方统一字体——小篆。小篆同其他文字相比，



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整化和匀称化。它去掉大篆中臃肿庞杂的部分,省去一些文饰性的符号,对于字体中相同的部件往往只保留一个,使书写更加方便。其次,小篆将大篆中的象形符号简化为线条,并且粗细均匀;字形更加匀圆齐整,呈长方形,奠定了“方块形”汉字的基础。

小篆的诞生,结束了从甲骨文以来 1000 多年汉字形体纷繁、写法多种多样的混乱局面,第一次使汉字走向便于识别的道路。小篆作为官方文字虽然只使用了十多年,但以政令手段在全国推行,对各地文化交流、文化发展以及汉字规范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小篆作为一种书法体,贯穿和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史,至今篆书仍然列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之一。唐代李阳冰和清代邓石如、吴大澂等都是以小篆见长的书法名家。

对于李斯小篆和秦泰山刻石,历代史家、书家、书法理论家评价甚高,推崇备至。李斯的篆书,风格严肃浑穆,平稳端庄;字体工整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结构左右对称,疏密适宜;笔画横平竖直,外拙内巧。唐代李嗣真《书后品》称:“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⑬唐代窦泉《述书赋》曰:“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如残雪滴溜,映朱槛而垂冰,蔓木含芳,贯绿林以直绳。”^⑭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列李斯小篆为“神品”,赞之“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⑮;《唐人书评》云其书法特点为用笔“骨气丰匀,方员妙绝”^⑯。宋代刘跂称“李斯小篆,古今所师”;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中则称:“拳如钗股直如箸,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⑰明代《岱史》中说:“秦虽无道,然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皆莫及。”^⑱中国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对秦刻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秦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⑲。秦泰山刻石上承大篆遗风,下拓汉隶先河,其在书法史上地位显要,堪称中国小篆之典范、书法之瑰宝,被史学家、书法家奉为圭臬。

三

秦泰山刻石目前仅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10 字,并且其中的“斯、昧、死”3 字为残字,全部为秦二世诏书内容,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秦泰山刻石的著录,最早见于《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中全文记录了秦始皇和二世的刻词内容。之后,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秦泰山刻石成为金石学家追踪的热点。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董道《广川书跋》等都对秦泰山刻石进行了著录,其中宋政和年间的刘跂对秦泰山刻石的记录、流传贡献最大。



秦泰山刻石残字

刘跂，字斯立，北宋人，祖籍东光（今河北东光）。刘跂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历官州学教授，知江州彭泽县，朝奉郎。绍圣四年（1097），跂因其父获罪而被贬官。刘跂自幼得父精心训教，善为文章，曾为赵明诚《金石录》作序，著有《学易集》8卷。刘跂对秦泰山刻石的考察当在其被贬官避祸于东平期间。据刘跂所作《秦篆谱序》载，他曾分别于大观二年（1108）、政和三年（1113）两次登上岱顶对秦泰山刻石进行考察，第二次得秦泰山刻石的完整拓本，共计222字，其中可以识读的有146字。而早于刘跂的欧阳修《集古录》载，刻石为“风雨所剥，其存者才此数十字”^①，为什么两人的记述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呢？刘跂在《秦篆谱序》中做了说明：“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为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②欧阳修言刻石所存数十字的内容，赵明诚在《金石录·秦泰山刻石》中有明确阐述，文载：“盖碑石为四面，其三面稍磨灭，故不传；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也就是说，宋代流传于坊间数十字的秦泰山刻石拓片是位于刻石南面的二世诏书内容，在刘跂进行细致考察之前，刻石其他三面秦始皇诏书内容因“稍磨灭”，不传于世。为什么刻石南面为秦二世诏书内容呢？董道在《广川书跋》中做了分析：“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诏书刻其三面，二世诏宜在其阴。今石南面为二世诏书，始皇帝刻诏书乃在北、西、东三面，盖石仆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乡，此其故也。”^③据《金石录·秦泰山刻石》载，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东封泰山时，究



州太守敬献的秦泰山刻石摹本共40余字,与欧阳修载于《集古录》的相同。依董道分析,早在宋大中祥符之前,秦泰山刻石就因年代久远而仆倒过,后不知为何人重新立于原址,并因三面文字“稍磨灭”,而错误地调整了碑刻的朝向。因此,秦泰山刻石虽仆倒过,但直至宋政和年间,仍立于原址,可识读的刻石文有146字。

金元时期为中国金石学研究的中衰期,故金元两代金石著述不多,对秦泰山刻石的记述散见于游记、诗文中。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曾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游泰山及灵岩、龙泉诸寺,并作《东游略记》及诗数十首,在其游记中有关于秦泰山刻石的记载。元好问之后,考察并留有秦泰山刻石记录的还有郝经与杜仁杰。蒙古宪宗五年(1255)九月,郝经登临泰山,并撰《太平顶读秦碑》诗,诗云:

岱宗太平顶,磨崖与天齐。左列则天颂,右刻张说辞。文采与书法,不离开代规。汉封宛在周观东,秦坛复出绝顶西。坛前圆平值中峰,突兀上有始皇碑。年深雨渍百裂余,析作两峰蹲半规。面阳数字仍可辨,隙缝重衔苔藓皮。中间隐约见“制可”,完好可辨惟“臣斯”……^②

由此诗可知,秦泰山刻石历经宋金百年风雨后,仅“面阳数字仍可辨”,并且刻石出现裂隙。此外,元代诗人杜仁杰在其《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中记录了自己于至元二年(1265)登泰山时所见泰山刻石的状况:“暮至绝顶,由东以望,见山影默黑,偃卧无际。顷观李斯碑,仅得数字,其余漫不可识。”^③由三人的简单记述可知,秦泰山刻石至金元时期仍在原址,只是风化情况日益严重,可识读的字已不多。

明代关于秦泰山刻石的研究、记录,主要分布在三类著述中,一类为金石专著,一类为泰山志书,还有一类为泰山游记。自明代开始,帝王不再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而改派官员祭祀泰山,并且相当频繁,这就为泰山留下了大量官员的登岱游记,这些游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明时的秦泰山刻石。比如明正德五年(1510),尚书乔宇游泰山,在其游记中云:“又上,为极高处,有玉皇殿,殿南为始皇封禅碑。”^④乔宇所称“始皇封禅碑”,即秦泰山刻石,在玉皇殿南。故至明正德五年,秦泰山刻石当仍在原址。而到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游泰山时,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其右为御史所栖。后一石,三尺许,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纵广及深具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⑤以



上王世贞所云“元君祠”，即今碧霞祠。所谓“其右为御史所栖”，即碧霞祠西墙外的明代西公署，在今玉女池之南约10米处，明代达官贵人皆止宿于此。^②所谓“玉女洗头盆”，即今之玉女池，其西有巨石高耸黝黑若鼎，形似山峰，明人查志隆题“天柱峰”3字，其下刻“斯碑岩”3字，秦泰山刻石残石即立于此。从乔宇和王世贞的游记中可知，迁移活动当发生在明正德五年（1510）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48年间，这是秦泰山刻石的第一次迁移。此后，吴同春分别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万历十七年（1589）两次登上泰山，并且均对秦泰山刻石进行了考察，甚至为了彻底弄清秦刻石的状况，吴同春专门请人将秦刻石从壁间取出，秦泰山刻石仅存二世诏书文3行，共30字。其他三面在重新迁移时，为方便安置，而“各加凿削”，刻石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后，谢肇淛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登泰山并作《登岱记》，云：“余居祠右公署。署后树李斯断碣，循而读之，通四行，首二字已刳毁，仅得‘臣斯’以下二十九字耳。”^③谢肇淛考察所记同吴同春的记述稍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经过明正德五年（1510）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间的这次迁移，秦泰山刻石残损严重，始皇诏书部分已模糊不可辨，仅存有二世诏书29字。

后泰山刻石又有了第二次迁移，被移至碧霞祠东庑。关于泰山刻石移至碧霞祠东庑的时间及迁移人，各志书记载有所不同。刊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泰山图志》载：石旧在岱顶玉女池上，雍正八年（1730）郎中丁皂保移至碧霞祠东庑。而清道光年间的《泰安县志》等清代后期的志书及碑刻均记载为明嘉靖年间由北平许某于榛莽中得泰山刻石29字，恐致湮没，而移于碧霞祠东庑的，但此记载与明吴同春和谢肇淛的泰山游记相矛盾，两人于万历年间登泰山时，看到的秦泰山刻石尚在玉女池，故嘉靖年间刻石移入碧霞祠的记载有误。

此后，秦泰山刻石屡遭劫难，损坏尤为严重。据徐宗幹、俞庆澜秦泰山刻石《跋语》记载：清乾隆五年（1740）六月，碧霞祠毁于火。重修碧霞祠时已不知嵌于东庑的刻石埋于何处，刻石遂亡。嘉庆十九年（1814），汪汝弼由济南知泰安，司理徐石生言于汪汝弼：岱顶有赵老人，年九十余，数十年前斫玉女池，见残石依稀有字迹。第二年，汪汝弼即委托来自常熟“雅志好古”的蒋因培带领同邑柴兰皋在山顶玉女池中搜得残石两块，尚存10个字，汪汝弼遂将残碑嵌于岱顶东岳庙西的宝斯亭内。清道光十二年（1832），东岳庙墙坍塌，宝斯亭被乱石覆盖，泰安知县徐宗幹“亟索残石于瓦砾中”^④，嘱道人刘传叶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岱庙西道院东壁间，并写跋记载事情经过。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石被盗，县令毛蜀云大索10日，得石于城北门桥下，后重置于岱庙院内。^⑤清宣统二年（1910），知



县俞庆澜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秦泰山刻石及徐宗幹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三块刻石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1928年春,国民党省政府临时驻泰安,改岱庙为中山市场,环咏亭被毁,移残石及徐宗幹、俞庆澜题跋碑于岱庙东御座院内,建实心砖亭嵌于其中,保护至今。



秦泰山刻石拓片

秦泰山刻石以其特殊的刻制背景及书体被历代学者所珍视,文人墨客争相摹拓,有的还依拓本摹刻于石。据史料记载: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登封泰山时,兖州太守就曾摹本以献,其摹本有40余字;宋庆历间,宋莒公(宋庠)摹刻47字本于东平郡;江邻几治奉符(今泰安)期间,“患四方求者日至,厌于供命”^⑩,又摹刻于县廨。宋政和三年(1113),刘跂亲至岱顶,捶拓墨本以归,“亲旧闻之,多来访问,倦于屡报”^⑪,乃为《秦篆谱》。元至元间,行台侍御史李处巽摹刻刘跂所拓本于建业郡。清乾隆间,邑人聂剑光以明拓29字本摹刻于县署土地祠《明太极图碑》之阴,现存岱庙碑廊。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以旧拓29字本摹刻于扬州北湖。清嘉庆元年(1796),山东督粮道孙星衍以明拓29字本摹刻于德州县学《高贞碑》碑阴,现存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嘉庆二十年(1815),蒋因培摹勒10字残石于郡城文庙,后泰安知府廷璐依据蒋因培所藏旧拓29字本摹刻一石,附于原刻10残字之后。清道光六年(1826),时任山东按察使的梁章钜委托泰安知县

徐宗幹依其所藏泰山刻石29字拓本摹勒上石,嵌于岱庙环咏亭西壁。碑现存岱庙东碑廊内。